

XIANGSHENG YI WAI

相声以外

相声以外

姜昆

姜昆



1257/421

版社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姜 昆

相声从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方 昉

责任编辑 朱发耕

相 声 以 外 姜 昆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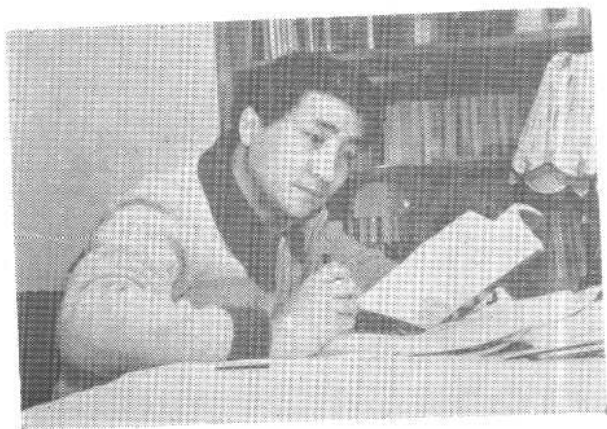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48 1/32 印张5.5 插页2 字数102,000 印数1—20,500

1985年5月第1版

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03·387 定 价: 0.88 元



姜昆在读书学习

说相声与学做人

- [1] 我当相声演员之前
- [26] 我当相声演员以后
- [40] 红领巾教我有意义地
生活
- [45] 嘿！少年官
- [51] 欢迎点名批评我

札 记

- [57] 攀登
- [74] 香港十日记
- [91] 访日散记

- 〔110〕 文华其人
〔113〕 运动·幽默·强者
〔116〕 阳光·海洋·鱼
〔118〕 我的业余爱好
〔120〕 忧与虑
〔123〕 记与电视结缘
〔126〕 在列车上
〔130〕 《大能人》拍摄记
〔136〕 不要廉价的笑声

关于相声创作

- 〔141〕 我写相声
〔146〕 老师教我写相声
〔150〕 探索·思考
〔169〕 向相声作者推荐

我当相声演员之前

记得是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妈妈总在我耳边唱：“小白菜呀，叶叶黄呀，三岁的孩子，没了娘呀……”唱着唱着，就有泪珠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，在她的轻声细调中，渗着我当时根本不能理解的情感。隐隐约约感到在母亲的目光中，似乎有着痛苦，也有着幸福。

一晃就长大成人了，走完了自己人生历程的第三十个年头。尝到了幸福和痛苦，可能跟妈妈的一样又不同……

1

红旗。阳光。红领巾。少年宫。辅导员。舞台。一切都是金色的。

童年的梦幻，是自己也能穿上漂亮的衣服，和伙伴们在水彩般的生活中玩耍、歌唱、欢舞。但是，弟

弟妹妹多，爸爸工资低，妈妈没工作，不得不使我多想上一点。不过我还是欢蹦乱跳地过着日子，一直到了三年级。但痛苦终于撞进心里来了。一次，我去景山少年宫玩，看到和我同龄的孩子，学着大人的样子拿着提琴盒，背着手风琴，拎着笙、管、笛、箫，走进那高高的宫殿中。于是，乐声开始了，我扒着门缝看……一直到把我轰走。我忍不住了，任性地和爸爸闹：“爸爸，我也去少年宫！我要当演员！”爸爸实在是惊奇了，清贫的生活和繁忙的工作，使他没能注意到孩子心灵的万花筒。

我曾经和许多孩子一样，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。我也想和许多伙伴一样，过他们那样富足的生活。但是，我上学买的水彩，是最廉价的，画出的画儿总不如人家那样鲜艳；我穿的白衬衫，是白布的，总不如人家府绸的那么白；背的书包，是爸爸用旧的大书包改的，总不如人家身上的神气。我看我们胡同里的孩子夏天去拣西瓜籽儿，一腌就是一大缸，到了冬天能卖好几十块钱，我羡慕了。于是，我背着爸爸，妈妈，跑到西瓜摊儿去拣瓜籽儿。不一会儿，我拣了满满的一瓷盆儿。我跑回家倒在一个洗脸盆儿里，又去拣。一边拣一边想，要是坚持拣上几天，拣好多好多，妈妈一定舍不得全扔掉，让她帮我煮煮，冬天拿出去卖。我先买一件……再买……正想着，糟糕！爸爸从那边儿走过来了。这么亮的地方哪儿也躲不开呀！我急中生智，用脏脏的手往脸上一抹，抹了个小黑脸。我想：这下爸爸可准认不出……“啪！”没等我想定，我的脑袋

上已经挨了爸爸重重的一击：“回去！”爸爸几乎是在吼。我飞快地端着盆往家走，没进家门儿，手中的瓷盆儿连同瓜籽儿，全让爸爸扔进了土筐。我第一次“自力更生”的计划，就这样完了。

这次从少年宫回来，我决定要依靠外援，不走自己那幼稚的自力更生的道路，于是，我就闹。想是我“闹”得够凶的，爸爸居然在发薪后，花了近一元钱，给我买了一支长长的笛子。痛苦走了，幸福来了！一个月后，我能吹歌了。又一个月，我又跟妈妈磨了一毛钱，考上了少年宫的笛子组。终于我也学着伙伴们的样子，一步步走向那高高的宫殿里面去了……

毕竟不是文艺世家，爸爸买的笛子“4”孔的音不准，根本不能用。我记着我吹“紫竹调”的时候，他还得意地给我打拍子呢！再让爸爸买，怕是拿不出钱来了。我又想了个“聪明”的法子，考了戏剧组，这个组不用花钱买这买那。我被录取了。

我排的第一个独幕剧叫《妈妈在你身旁》。我演主人公黑牛——一个台湾的流浪儿，靠擦皮鞋为生。“六一”儿童节，他偷偷地告诉一个不相识的小姑娘：“大陆那边的孩子可幸福呢，他们上学、游园……”正在憧憬中，恶煞般的警察把他抓走了。临去时，他喊：“坚强点儿，妈妈在你身旁……”排这个戏，我不知掉了多少泪。好几次想起小时候妈妈唱的歌：“小白菜呀，叶叶黄呀，三岁的孩子，没了娘呀……。”

还有一次，又想起妈妈的歌。那是在北京秀丽的西山鹫峰岭下。我们和周总理请来的阿尔及利亚烈士

子弟共度夏令营的假日。星光闪闪，篝火熊熊。火光映着红红的笑脸，胸前飘着红红的领巾，红红的队旗飘啊、飘啊……周围全是红的。当我们的乐队奏起非洲的“达姆——达姆”乐曲，我发现异国的伙伴们眼圈也红了，篝火映在他们浸着泪水的眸子中，大家全静了。妈妈那歌声又出现了……

“幸福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！”我觉着这句话在我胸中一个劲儿地翻腾着。我在为祖国骄傲，我觉着我祖国的小主人翁。我有权利用我所喜爱的艺术来为她服务。

2

我热爱艺术着了迷。六年级毕业时，我闹着要爸爸带我去考中国戏曲学校。为了省钱，我跟在爸爸屁股后面，由东四走出了前门楼。我心里的高兴劲儿，自然不用提，一路上就是想考试时将会怎样怎样，……我想：唱歌时，调子不能起得太高，不然，扯着脖子跟鸡叫似的最难听了。

到了戏曲学校的大门口，爸爸留神地向门内看着：学戏曲的小学员，剃着光头，穿着灯笼裤，再大一点的，用手捧着茶壶，一边看看来考试的孩子们，一边说着笑着。再看那边儿，光着膀子的青年们汗流浹背地站在草地上，翻斤头，拿倒立，黝黑黝黑的。爸爸心痛了。看了看他们，瞅了瞅我，拉着我往回走。我问他：“怎么不考了。”他说：“不考了！”我真奇怪，

可他也不说理由。我记着回家后，他跟邻居一个大爷说：“十年出得了一个秀才，十年出不了一个艺人。孩子还得念书！”

我没有过多地揣测他内心的活动，但对于前途，我觉着选择的权利还在我的手里。好在我的年纪还小。我今天借来手风琴，着魔地拉上一个下午，明天找来一个扬琴，用筷子削成签子，打上一个星期天，又朗诵，又唱歌，高兴了还自己写上几段快板数起来。姑爷说我是个“多方面的爱好者”，爸爸谦虚地回答：“他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。”

十四岁那年，我在中学里写了入团申请书。共青团的一个干部找我谈话。“姜昆，你将来想干什么？”我一点也没犹豫：“搞文艺。”“你是什么出身？”“职员，我爸爸是老师。”“不对，据我们了解，你出身是资本家。”“我爷爷是资本家。”“出身都得算爷爷！”我愣住了，因为我知道那时候这样的出身对人意味着什么。我竭力分辨，说我爷爷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资本家，解放以前买卖就倒闭了，他的财产只是一点点儿。还告诉我，我的叔叔、姑姑都是共产党员，他们全是党的干部。“甭管怎么说，你是吃剥削饭长大的！”我茫然了。

我的心里罩上了阴影。我还是个孩子，这一切影响了我的现在，可将来呢？将来呢？我觉着苦恼。在学，我是学生会文艺部的负责人。我们灯市口中学男校，在男学校里搞文艺，经常遭到一些伙伴们的讥讽，你组织跳集体舞，他们说你象“假媳妇”。你带

着学唱歌，他们跟着瞎编词儿。那时候唱“我们走在大路上”，他们在下面接“卖冰棍的对我嚷嚷”。可这一切我从来泰然处之。我带着腰鼓队参加了“国庆狂欢”的活动，学校的“红五月”歌咏比赛，我戴着白手套指挥。搞这些活动，我的心总有一团火，因为我爱呀，我爱艺术。可是，从我的出身由父亲改到爷爷那儿，一下子把我的这点火给扑灭了。我不敢再出头，不再再组织这、组织那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还偶尔参加少年宫的活动。一次《白求恩大夫》摄制组看中了我，约我去参加白求恩大夫进村的一段拍摄工作。现在电影中，从村口出来发现白大夫来了，往村里跑、招唤人的那个小八路就是我。拍摄地点在河北的一个专区，我去了五天能拍电影，这在家里可是新鲜事儿。我回到家，他们都想让我讲讲怎么拍电影，我不理他们。爸爸七点半钟才下班回家，我七点就钻到我的小屋里去睡觉，我怕他们问我，我也不愿意谈。我不愿意谈我怎样羡慕人家拍电影，我不愿意谈人家怎么夸我“一个小镜头也拍得那么认真。”因为我觉着那种生活永远不属于我。谈那是痛苦，从我七点钟钻被窝，十点才能睡着，就可以证明。

有一句老话，叫作“因祸得福”。我开始努力学习功课，从同学那儿借来一摞一摞的书，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小说、自传，我全看。连续两年，我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“优良奖章”，功课一直在中上等不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差不多能拿个银牌。可是，我没

能入团，我出身不好。

3

希望的火花，总带有点“野”性。风儿一吹，就在灰烬中出点光，放点热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我又长大了些。象我这样出身的青年，更该收敛一些吧。恰恰相反，“债多了不愁”。既然爸爸进了学习班，爷爷被轰到乡下，厄运已经到了头上，我则玩世不恭地“逍遥”起来。

红卫兵“大串连”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允许我们这种出身的青年出去“串连”了。我有限同学们一块走，约了几个出身不好的邻居孩子结伴。我们约好了，到外地就说出身“红五类”，不带钱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，写欠条儿。在这层虚伪的面纱后面，居然激起了我心底中的真实乐趣。火车上，我每天早上带头唱《东方红》，过武汉长江大桥后，我利用夜间停车的时候给他们朗诵《难忘的航行》片断，惹得全列车的人欢呼“毛主席万岁！”达十分钟之久。我没别的更多的想法，只是在我绘声绘色的朗诵中，看能吸引那么多人的目光盯着我，我过瘾极了！

一九六七年五月，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二十五周年，荒芜很久的文艺舞台上，借着这个机会又暂时地“繁荣”了起来。一时间，许多红卫兵和中学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。我想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有点“文化”的味儿了

(我把“文化”和“文艺”看成一个词了)。我的心痒了起来，叫了几个也非常喜欢文艺的伙伴，拉起了一个“红卫兵话剧团”，尽管当时起这个名字我有些胆怯，但是，心中的火一烧，总觉得热呼呼的！

我们先是在一个同学的小木板房里写剧本，他写一幕，我写一幕，写完了往一块“串”，没有两个星期，一个六幕八场的话剧写出来了！我们说好了，甭管戏怎么样，只要每一幕的结尾能让人鼓掌就行。

那个时候，有点“胆子”，没有办不了的事。没有排练的地方，有人以红卫兵司令部的名义借来了东单三条一个被抄的小“牙科医室”，根据地有了；没有服装，找人弄来了“首都红卫兵司令部”的介绍信，到被解散的实验话剧院去“借”；没有布景，四处去找木头做，东拼西凑。所有东西全是“借”的，这种“借”跟“敲”人家一样，不给是不行的。

一九六八年的元旦，我们的“戏”居然在首都“上演”了。我在戏里扮演一个流浪者——失业的苏联汽车司机阿辽沙，人物就是从过去《以革命的名义》里面的雅什卡套过来的。这场演出，该要人鼓掌的地方，全鼓掌了！多兴奋呀，继续排，继续演，一连演了五十多场。整半年多的时间，脑袋一直是热呼呼的！虽然我终于登上了舞台，并且也沉浸在“掌声”之中，然而，我所追求的艺术，却是那么可笑！

最后一场是在帅府园的一个剧场演出。演出前，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：“我报名上山下乡了，去北大荒！”伙伴们全惊住了，都舍不得我，我也舍不得我的

伙伴。可是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因为我看到在生活的道路上，又燃起了另一束希望的火花……

4

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，那可真是大浪啊，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，它点燃了我心中希望的火。记得在没几个月前，一想起毕业、分配，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暗浑浊的迷雾。但上山下乡一动员，我木然的情绪活跃了起来。我想：在荒凉的异乡，在偏僻的山沟里，可能需要我了吧！那同样是祖国母亲的怀抱，在那里，我不是照样能把我赤子的心献给她吗！一想到这儿，血就沸腾了起来。

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，首批离开北京，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——北大荒。

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没有安慰爸爸、妈妈，也没有给弟弟、妹妹留下什么嘱咐的话。

登上了北去的列车，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认识的青年组成了“列车宣传队”，我唱呵、跳呵，使尽全身的解数，讴歌新的希望。晚上，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给同学们写信：“……在过去生活的路上，我的希望全象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。今天，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，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。”

踏上北大荒黝黑的土地，我们就陷入热情欢迎的感情潮水之中。我们这群十七、八岁的学生，一点乏劲儿都没有。稍微填填肚子，我们就开联欢会，慰问

贫下中农。这个联欢会上，我一个人拳打脚踢，演了五个节目，一会儿独唱，一会儿朗诵，一会儿拉手风琴，把我累坏了，也把我乐坏了！一个当地的红小兵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叔叔，你老在我们这疙瘩吗？”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：“不走了，老和你们在一块儿！”

晚上，分配方案下来，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，参加了农场“业余宣传队”。新的生活开始了！我们十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，一边劳动，一边搞宣传。

我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在“深入生活”中开始“创作”了。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厉害，还得挨着蚊子和“小咬”的袭击。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起床，晚上一写东西又兴奋得睡不着觉，而十七、八岁，又是正贪睡的时候，我真感到了有点儿“艰苦磨炼”的劲头儿。在日记本上我写下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“我愿中国青年只向上走”来激励自己。宣传队演一场节目，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，上台就是从头顶到尾。扁桃腺化脓，发烧到39度，也得上台，不然“影响战斗”太厉害。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，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。

这样的日子没过两个月，宣传队的指导员找我谈话了，他说我“不稳重”“浮躁”，要我不要“锋芒外露”，要注意“突出政治”。我想了很久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照办了，并且也学着怎样“稳重”。

可是有一次，不知哪股心气儿鼓动我，我嘴里冒

出了一句过去流行的歌儿：“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……”，被领导知道了。全宣传队开了一个会，说是“严重的政治问题”，让大家帮助我。大家的措词非常严厉，我也害怕极了，痛哭流涕地作了检讨。从此，宣传队里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姜昆啊，有才无德。”

一天，我们宣传队正在排练，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，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十个人，没有经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。他们质问：这十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，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？！

热情下降了，人的心散了，宣传队每况愈下，脑筋稍微活络的在找路子去哪个生产队。一天，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，没等我开口，他说：“你要做好艰苦锻炼的准备，组织上把你分配在一个新建点。”新建点就是荒原上建一个新的生产队，住的木板房，铺的是草垫子，一切都要白手起家。我的眼睛红了，不是为了新居的孤寂、荒凉，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……

5

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，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点——七连。

我是六六届，年龄稍大点。没几天，领导让我当班长，带着十一名上海青年脱土坯。时间一长，这些“小上海”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我“柴爿”。原来，他